

日治中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 臺灣之認同糾葛——以精英為主的分析

陳佳宏*

摘 要

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有些人的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利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一些臺灣精英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概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

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遭扼抑，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面對沉重的壓抑。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日本化」功敗垂成，但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未料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發生，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為兩個歷史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為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

關鍵詞：認同、族群關係、二二八事件、臺獨、臺灣主體性。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臺灣——這個孤懸在東亞海域的島嶼，其對外地理空間的封閉特性，理應使島上住民產生休戚與共的認同感；只是，也許是內部自然地理空間充滿阻隔，使得從早期移民拓墾以來，直至清帝國治臺末期，臺灣之「認同」（Identity）仍在摸索中游移著。即使是甲午戰後的割臺一舉，促成「臺灣民主國」之建立，臺灣圖像首次被標舉，建制上儼然具備某種程度的「符號主體性」（Subjectivity of Symbol）；然而，其實況卻徒具形式，各地官民間因著種種利害關係的牽扯，臺灣之認同依然處於一種紛雜的狀態。

日治時期臺灣處於帝國之邊陲，被視為日本南進基地及跳板；隨著殖民下近代化的開展，交通資訊網絡的流動、廣佈，臺灣全島在內部的地理空間上，反而首次被緊密連結在一塊而成為一處有別於日本內地的特殊領域，也形成臺灣人初步的共同意識。¹但是，臺灣之認同未必能與客觀的外部環境相契合，依然在情感與現實交戰中，懷著糾結的認同，複雜地面對日漸交惡的昔日「祖國（中國）」和今日「母國（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依據聯合國²最高統帥對日本所下之第一號命令，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接收臺灣。³此舉被許多臺灣人視為重回祖國懷抱，較樂觀者且認為臺灣之認同歸屬從此當可塵埃落定於中國，不再需要於情感和現實中掙扎、游移。但未料國民黨政府治臺人員未能符合臺灣人期待，回歸後未及兩年就爆發二二八事件，加之主政者未以善意處理，令脆弱的臺灣之認同再度翻攪波瀾。

1 黃昭堂，《臺灣那想那利斯文》（臺北：前衛，1998年），頁11。

2 雖然「聯合國」的「實體組織」直到1945年10月24日才正式成立，但「聯合國」之名稱，在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宣言中已正式使用；在二戰中及戰後初期，盟國亦使用「聯合國」為代稱。

3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下達岡村寧次第一號命令：民國34年9月9日〉，秦孝儀主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90年），頁185-186。

考察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論述，可大致將「認同」之產生歸納為幾大類：一是「原生論」（primordialism），認為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在有形文化特色或生物上的特徵；其次為「結構論」（structuralism），以為一群人集體認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不滿己身在政治權力、經濟財富或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精英動員的工具罷了；⁴第三則是「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主張認同都是人為所建構，因此強調共同歷史、經驗、或記憶等基礎，才是決定認同的關鍵，簡言之，即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⁵

二戰前後臺灣的認同圖像可含括上述說法：有基於血統文化上之漢民族、華人認同乃至祖國、中國認同；基於現實利害關係之日本認同；當然也充滿許多想像的認同。縱使在主客觀條件的快速輪轉中會時有偏重，但逐漸形塑其認同主體性的趨勢則是不變。本文便試圖以「二戰結束」與「二二八事件」為兩個轉折點，以臺灣精英為討論重心，分析其間臺灣之認同糾葛。

二、日中認同之爭鬥

滿洲人所成立之清帝國，隨著歲月的流轉，以及漢民族之「集體歷史失憶」，到了19世紀下半葉，滿漢一體的觀念業已盛行，⁶清帝國之符號遂成為漢人正統象徵。固然徵諸歷史，這是一種矛盾的認同，⁷但1895年臺灣

4 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臺北：前衛，1998年），頁74-75；施正鋒，〈臺灣意識的探索〉，收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海峽學術，1999年），頁60。

5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1999年），頁10。

6 李國祁，〈滿清的認同與否定：中國近代漢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96-97。

7 陳佳宏，〈清代至日治初期臺灣之認同糾葛〉，《輔仁歷史學報》第15期（2004年7月），頁299-304。

被割讓一事，猶然被視為遭「同族」拋棄；多年後，許多臺灣人依然眷懷過往的父祖之國，將其視為漢民族認同之淵源。日本政府就體察到：

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卻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且其故鄉福建、廣東二省又和本島只有一衣帶水之隔，雙方交通頻繁，且本島人又視之為父祖塋墳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⁸

透過家族的祖國認同之傳承，雖身處於日本統治之下，有些臺灣人對一水之隔、具有悠久歷史文化與廣博豐饒土地之「唐山」——中國，⁹懷抱孺慕之情，¹⁰認為有朝一日祖國必然會來「拾回」這個東海孤兒。¹¹1907年林獻堂往訪中國知識份子梁啟超時便感觸道：「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¹²然而，其中的盲點，在於此美好的中國圖像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種具體的存在，¹³可視為情感認同或想像的認同。因此，回歸到現實處境，林獻堂等人在尋求初期社會運動之合作對象時，便無法仰賴現實中持續積弱的中國，而必須屈就現實認同去尋求日本貴族

板垣退助等人的協助。

在臺日合作基礎下，1914年成立「臺灣同化會」以利工作推行；然則雙方對同化會的設定與期待卻有頗大的落差。在板垣的認定裡：「內地人與本島人本是同文同種，德育上有相一致的地方，因而同化並非難事。」¹⁴可見板垣等日人是懷著「同化臺人為日人」的「融臺」期待；不過，臺灣人參加同化會的動機，在於迫切期望改善被殖民統治者的差別境遇，¹⁵即為「脫日」。臺日雙方在「融臺」與「脫日」的認知之間，差距可謂千里，無怪乎曾被譏為一場同床異夢的滑稽劇；¹⁶更何況有些日本官員根本不認為臺灣人可以在短時間內達到「日本人的境界」。¹⁷

然而，臺灣人還是以此為肇始，開展1920年代前後一系列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軸、「臺灣文化協會」為民眾啓蒙的社會運動。在這些運動宣傳中，顯然與某些日人期待將臺灣人「同化為同民族」之同化精神背道而馳；況且，有些臺灣人自矜為擁有承繼祖國之漢民族光榮傳統文化的「文明人」，擔憂遭到異民族——日本統治政策的摧殘，因而鼓吹：「我們應該喚起漢民族的民族自覺，把臺灣做為我們的臺灣，自己統治自己。為排除屈辱團結起來。」¹⁸

儘管臺灣人在民族立場上與日本之截然區分，但臺灣社會運動基本上仍是以認同日本國家主權為前提，在體制內追求臺灣地位的提昇和改善，而非斷然與日本作完全的政治切割。以蔡培火為例，他便說：「臺灣是帝

8 〈考察臺灣社會運動的基礎觀念〉，《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臺北：創造，1989年），序頁2-3。

9 此所指涉的「中國」，為地理空間上的意義，應類似「歐洲」的概念。

10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3。

11 李喬，《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1989年），頁108。

12 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林獻堂先生追思錄》（臺北：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年），頁29。

13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1920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賴澤涵、朱德蘭主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2005年），頁110。

14 〈板垣伯爵再度來臺及創會式〉，《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頁12。

15 許世楷，〈日本支配臺灣的機制與意識型態〉，收於臺灣研究基金會策劃，《百年來的臺灣》（臺北：前衛，1995年），頁38。

16 葉榮鐘等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頁22。

17 後藤新平認為，臺灣人至少要經過80年的文化同化才可能晉升到日本人的境界；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1988年），頁184。

18 〈文化協會對社會的影響〉，《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頁224。

國的臺灣，同時也是我等臺灣人的臺灣」，¹⁹即便強調臺灣屬於臺灣人，但未將日本認同排除在外。

實際上，就算板垣等日人同化臺人的期望沒有達成，但同化會仍企盼另一理想層次之實踐，即將臺灣之同化，類比為日中兩國和平橋樑之構築：

如是使臺灣三百萬島民悅服於王化，終歸於渾然一體，成為忠良國民，即可進而為日支兩民族交融之階梯，鞏固東亞和平之基礎，以資興亞之大計。²⁰

此以臺灣人擔當日華親善橋樑之構想，確實獲得一些臺灣人的共鳴。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舉行創會大會時吳海水發表言論：

臺灣島民是日本臣民，而又為支那民族。因此，我們所期望著，在於促進我們民族文化之提高，並且成為日華親善的楔子。²¹

另一位周桃源醫師也附和道：

世界大戰後，在自由平等，民族自決聲浪高漲的現時，我們同胞應該互相奮發，成為日華親善的楔子，為亞洲和平的鞠躬盡瘁。²²

然而，時值中國遭受日本欺凌和進逼，這種所謂的「日華親善」或「中日合作」之片面主張，骨子裡常隱含一連串日對中的不平等待遇，此際臺灣人的橋樑角色有時不免淪為「幫兇」。若從日中衝突隨時序演進而不斷升溫來看，足見臺灣人擔當溝通橋樑之成效不彰，或者臺灣人根本沒有資格擔當這項重任。畢竟臺、中雙方同為日本帝國宰制下的被壓迫者，臺灣人不過是日本建構東亞共榮圈的一顆棋子罷了；在日中對抗裡，臺灣人始終缺乏主體性，而僅能繼續在日中之間尋覓其認同依歸。

同情弱者——中國的情愫，伴著日本對臺的差別待遇而揚起，尤其當日本炫耀其侵中戰果，迭遭日本壓制的臺灣人就會跳進「祖國中國」的觀念裡，或遁入現成的「血統關係」，²³產生一種與中國同病相憐的投射。據調查顯示，1929年4月26日臺北市榮座上映「滿蒙大激戰」記錄片，當螢幕出現日軍被敵彈擊中的場面時，觀賞中的臺灣學生便歡呼狂喜，反之，一旦看到中國兵士挨槍倒下就嗚咽不已。²⁴這些臺灣青年對本國（日本）與現實上的敵國（中國）之戰場勝負的反應，竟是一面倒地站在敵國方，而呈現一種敵我角色認同的錯亂；更激進者，且將中國稱為「吾國」，而視日本為「異族」。²⁵若基於全體同屬日本帝國成員的立場而論，臺灣人這種表現，無異是將敵國當成祖國；易言之，對日本來說，在帝國境內生息著這麼多數量的「敵國餘孽」將是何等重大威脅。

攀附大正民主時期下之1920年代前後以降的臺灣社會運動，即便擁有日治以來臺灣民權的黃金時光，可以大肆放言高論，甚至抨擊總督府政策，但往往一碰觸到中國認同議題，就成為一大政治禁忌。曾任「臺灣民眾黨」幹部的楊金虎便回憶：

19 蔡培火，〈我島與我等〉，《臺灣青年》（1920年10月第4號），《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頁28。

20 〈關於臺灣同化會所首倡者〉，《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頁8。

21 〈文化協會的成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頁191。

22 〈文化協會的成立〉，頁190。

23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蓬島文化，1980年），頁689。

24 〈臺灣問題概要〉，《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五）右翼運動》，（臺北：創造，1989年），頁22。

25 李友邦，〈臺胞未忘祖國：民國廿九年八月〉，收於秦孝儀主編，《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年），頁16。

當時日政官憲雖認真監視吾輩行動，但未曾受過甚無理壓迫，祇開會前要報告，派警員來監視。有一次余站起演講中，因談及「我的祖國」四字，就遭不准，即受辯士注意，中止演講。以後吾輩就注意言詞，若不抵觸時罵天罵地都無妨。不准講我中國，不准批評天皇以外，首相以下總督有不正，政治有歪曲，都可以儘量批評痛罵一番……²⁶

日本將臺灣與中國的連結、臺灣人對中國的祖國認同禁忌，與神聖的天皇地位並列，同為臺灣人所不可逾越的認同枷鎖。在武力進逼上，此時日本對中國可以所向披靡、予取予求，然而，面對臺灣這群前清——中國遺孽，有時卻流露一種不安的情緒，唯恐中國幽魂從臺灣人的血液裡反撲回來。在日本眼中：

臺灣人的血液是留有支那人之成分，在經濟戰上內涵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且依照支那人特有的巧妙商法漸漸奪走日本人的職業。²⁷

這種對臺灣人「邪惡血統」的疑慮，也顯示在基隆市役所勸業課長赤木猛市的意見書中：

島民中較有明察力，對母國抱有反感者豪語曰：「無需等待文化協會或其他思想團體笨拙的牽制運動。二十、三十年後必可驅逐在臺灣的內地人，或者在經濟上使之無力是輕而易舉的事。」²⁸

如此帶有血統「原罪」的臺灣人如何能取得日本人之信任？尤其當日

本決心投入對中國的全面攻勢，謀求「大東亞共榮圈」之實現時，如果殖民地的臺灣人對日認同上存有貳心、懷抱中國認同，這不僅無法提供日本助力，反倒可能成為帝國背後的芒刺。因此，為未雨綢繆，日本決心徹底拉攏、收編臺灣人之母國認同。以1930年9月臺北所成立之「大同促進會」為例，就力促臺灣人對日本殖民母國的認同與效忠；「九一八事變」後，「大同促進會」為表達臺灣人擁護帝國之舉，在1933年發表〈大同促進會非常時期宣言〉：

站在臺灣同胞的立場，吾人肯定內地延長主義，所以進一步策勵具體的方法，要求真正的內地延長政策之實現。站在亞洲民族的立場，吾人肯定大亞洲主義，是故同時又致力促進真正的亞洲聯盟之確立。²⁹

日帝國要求臺灣人服膺「內地延長主義」，做到真正無貳心的日本認同，徹底斬斷對中國認同的綺想，回歸到現實的日本認同；並要臺灣人對其侵略行為背書，以「大同」及「大亞洲主義」來粉飾其宰制亞洲的野心。但弔詭的是，用以凝聚臺灣人之對日本認同的方式，竟是以富含濃厚中國認同之漢儒思想的「大同」為號召，顯見日本認同層次之多面向與複雜度。

無論如何，日本收編臺灣人的腳步，還是配合其戰爭步履，既快且急。1933年12月10日在臺中市民館，幾位臺灣社會運動的要角，包括陳炳、楊肇嘉、黃朝清、葉榮鐘等人，與日人討論亞洲情勢。會中得到的結論，自然是與日帝國的期待相符，即認為宜組成促進亞細亞民族融合為目標的團體。為此，以宮原、陳炳為規約、宣言的起草委員，而於12月29日用「東亞共榮協會」名稱在臺中市公會堂舉行創會式；由陳炳擔任理事，黃

²⁶ 楊金虎，《七十回憶》（臺北：龍文，1990年），頁74。

²⁷ 〈臺灣問題概要〉，頁25。

²⁸ 〈臺灣問題概要〉，頁25。

²⁹ 〈臺灣問題概要〉，頁46。

朝清、楊肇嘉、葉榮鐘、洪元煌、張煥珪、張聘三等臺灣人擔任委員，林獻堂則擔任本會顧問。³⁰其〈東亞共榮協會主旨書〉說道：

我臺灣對亞細亞聯盟的達成，擁有獨特的使命和立場。時到如今，它是日本帝國最重要的領土的構成部分，人民均沐浴於一視同仁的聖澤下。在臺灣、內臺人的親善融合為最自然的歸結，這是不必待言的。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上尚具有更多融洽、親善餘地的現狀下，如何除去存在於內臺人間的不自然狀態，如何填補兩者之間的嫌隙，以期振作渾然一體的皇道精神，委實是國家的百年大計，且為現下非常時期日本的急務。³¹

處於非常時期的日本，也就是走向建立亞洲新秩序之日本帝國主義，對強固臺灣的日本認同，自是深感迫切；在島內，以「內（日）臺融合」為標榜，號稱朝著促進亞洲民族福祉的目標邁進，期望吸納臺灣精英加入，掀起帶頭作用，並能深入到臺灣各階層，以翼助日本之東亞共榮大業。縱然不是所有的臺灣人都認同日帝國主義之行徑，所以有一些人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尋求中國認同而投奔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走上與日本認同分道揚鑣之途；他們認為除非打倒日本帝國，否則臺灣是得不到解放。然而，時趨附中國認同而為孤注一擲者終非主流，有些臺灣人如林呈祿等便認為臺灣既然早已經被中國捨棄，因此，臺灣人必須協助日本帝國，³²來謀求臺灣人地位的提昇。

不過，繼續游移認同於日中兩方者仍不乏其人，例如林獻堂雖已加入認同於日帝國主義的團體，但他在1936年春，偕家人參加「華南考察團」

歷遊中國各地，³³於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辭時有「林某歸還祖國」之語，³⁴還稱說「僑胞在臺灣是有國難愛的」，隨後並至南京謁中山陵。³⁵林獻堂自比為中國寓居日本國——臺灣的華僑，並宣稱中國之難為「國難」，明顯流露出其中國認同。林獻堂這些在中言行，後為媒體所揭露，且對林大加撻伐；此亦難見容於日政府，因為林是臺灣的指標性人物，動見觀瞻，若未懲治，恐有上行下效之虞。不過，其事僅言詞失當尚不能繩之以法，所以軍部參謀長便唆使日本「愛國政治同盟員」賣間善兵衛毆辱林；此即為「林獻堂舌禍事件」或「祖國事件」。³⁶

以林獻堂在臺灣人中的顯要地位，尚不能在日中認同的爭鬥裡倖免，更何況其他敢顯露出一絲中國認同者。日本政府極思將臺灣的認同定於一尊，以求一勞永逸地讓臺灣成為日帝國南進政策之最堅實堡壘。接續著前期「同化主義」之餘緒，從1937年始，配合日帝國戰爭動員體制，如火如荼地展開了「皇民化運動」。就理念構成而言，它是「同化主義」的極端形式；就實際需要而言，它是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一環。基本目的，就是要改造包括臺灣人在內的殖民地人民為「真正的日本人」，易言之，就是徹底的「日本化運動」。³⁷

皇民化運動之前期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本時期特點著重於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致力於消弭臺灣人的祖國觀念；在民間的戰爭動員

30 〈臺灣問題概要〉，頁57-58。

31 〈臺灣問題概要〉，頁59。

32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自由時代，1989年），頁167。

33 在日中協議下，日本人渡航中國不需持護照即可通行，但此不適用於臺灣；依據〈外國旅券規則〉第四條規定：「本島人非持有依此規則發給之旅券者不得渡航外國。」臺灣人由臺灣前往中國必須申請護照；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法規提要》第5輯（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年），頁24。日本曾大言臺灣是清國割讓的新領土，臺灣島民是新附之民，法律上是日本國臣民；然其所以採取上述矛盾的措施，是為了要控制、防止臺灣人在臺、中之間展開人際往來；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1994年），頁236-240。

34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1995年），頁136。

35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1970年），頁314。

36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頁136；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08-315。

37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3年），頁35。

演習中，中國象徵的蔣介石及美國總統芻像被當成人像靶子供小孩潑水玩耍，³⁸灌輸臺灣人更多的仇中恨美意識，製造「日臺一體」對抗「中美聯合」之同仇敵愾的情緒。同時大力宣揚「日本是爲了建設東亞新秩序而興正義之軍」，進行的是「聖戰」。³⁹1941至1945年爲「皇民奉公運動」時期，臺灣「皇民奉公會」則於1941年4月19日成立，其指導思想爲：

建設高度國防國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顯示國體，徹底灌輸皇民精神，使六百萬臺灣人民爲日本盡忠，實踐舉島一致的臣道。

他們號召：

六百萬島民，不問種族、宗教、生計如何，渾然融合，盡量減少磨擦，拋棄一切對立觀念，形成「臺灣一家」，以舉萬民翼贊之實。⁴⁰

一時之間，無論自願或非自願，臺灣各界精英幾乎都被網羅進皇民奉公會，而成爲奉公會成員也似乎成了時髦的頭銜，甚至有曾以抗日自傲的某律師，都因爭不到皇民奉公會部長職位而流淚訴苦。⁴¹

「皇民化」比之前的「同化」還要強烈，因爲這還要遵守日本天皇所頒的「教育敕語」，堅信「大日本帝國乃是神國」，並強調盡忠報國也是盡孝的一種。⁴²其它還有廢漢文，推行國語（日語），改姓名，裁撤偶像、寺廟而代之以日本的神道教信仰等，來破壞故有臺灣的文化精神層面，特

別是與過去中國的連結。以「改姓名」而言，在新的日本姓名之選擇上，官方所明禁的四類姓名中的第三類，即明列「與原來之姓有關之中國地名」。很明顯地，臺灣殖民當局預知，如果不事先禁止臺灣人採用中國姓氏之地源名稱爲新姓名，改姓名政策一旦實行，一定會有許多臺灣人取巧採用，⁴³所以不願臺灣的中國認同藉此「借屍還魂」。

然而，日語的推行卻有大幅成長，根據統計，在1937年臺灣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者，佔全人口的37.38%，1940年達到51%，1943年已超過全人口的8成；⁴⁴到日本戰敗前夕的1944年，臺灣接受殖民地基礎教育的學齡兒童之升學率爲71.30%，男女之別分別是80.86%及60.94%。⁴⁵如此高比例的日語教育人口，難怪有人（臺灣文學家葉石濤）根據其個人經驗，斷言戰爭結束時，臺灣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日本化了。⁴⁶於是街上充滿以忘記臺灣話爲榮，滿嘴流利「國語」的「善男善女」。⁴⁷1920年代以來轟轟烈烈的反日鬥爭早已不見蹤影，日本認同在臺灣人意識裡可謂取得相當的優勢。

臺灣人日本認同之高點，還表現在對大東亞戰爭的熱潮上；1943年日本政府招募1,000名「志願兵」時，600萬人口的臺灣，竟有60萬人應徵請願。⁴⁸「血書志願」更蔚爲一股風潮，年輕人寫血書的狂潮與戰爭相始終。⁴⁹這股風潮也感染了臺灣原住民，以「高砂義勇軍」的名義到南方戰線作戰的800名左右的原住民所顯示的熱血，比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⁵⁰實

38 鄭欽仁口述，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訪問，《鄭欽仁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2。

39 《臺灣事情》，1938年，頁197-198；陳小沖，〈1937-1945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收於陳孔立主編，《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1991年），頁496-497。

40 《臺灣經濟年報》，1942年，頁16；陳小沖，〈1937-1945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頁497。

41 黃昭堂，《臺灣那想那利斯文》，頁17。

42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頁171。

43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57。

44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49。

45 E. P.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47.

46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29:4 (1991年12月)，頁158。

47 黃昭堂，《臺灣那想那利斯文》，頁17。

48 《興南新聞》，1943年2月13日，版2；古野直也著，許極燉譯，《臺灣近代化秘史》（高雄：第一，1994年），頁10。

49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69。

50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草根，1999年），頁150。

際上，並不易判斷這股從軍熱潮是否帶有日政府強迫性的措施，也許志願及被迫的人都有，尤其不可忽略從軍的實利性，對當時代的人具備一定程度的誘因；當然，戰時集體催眠下所燃起的愛國精神也不能忽視其魔力。

總之，皇民化運動因為戰爭的結束嘎然中止，而將臺灣人改造為日本人的終極目標亦未曾達到，但臺灣人的「中國性」卻因此多少有所減低，尤以青少年為然。戰後的臺灣可看成是臺灣人對「中國性」的重新認識與調適的一段歷程。不幸的是，戰後來臺的卻是一個集負面「中國性」之大成的陳儀政府。⁵¹所以，縱然日本認同因戰敗而逐漸遠離，可是嶄新的中國認同卻未必就此定住臺灣，而能一舉取得日中認同之爭鬥的完全勝利。

三、中國認同之盛衰

當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進行軍事上的一大冒險時，臺灣人對未來前途其實充滿著不安和期待。不安的是：日本戰敗時，會發生混亂；日本戰勝時，日本人會更加橫行霸道。期待的是：日本戰敗時，臺灣可能解放；日本戰勝時，臺灣會更加發展。⁵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幸運地，臺灣人所擔心的混亂情況並沒有發生；直到日本投降多日後，安藤利吉總督仍然公開表示670萬臺灣人和日本人所走的道路是一樣的，他很驕傲的表示，臺灣人並沒有採用暴力對付日本人。⁵³也許這可視為臺灣的日本認同並未因為日本戰敗便驟然翻臉無情，使得戰後初期的臺日關係尚稱平和。

由於二次大戰同盟國的決定，臺灣劃歸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收；這段等待盟軍接收的空檔期間，各地臺灣人自動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來維持秩序，達成史上罕見的「自治奇蹟」。在此「一閃即逝的七十天的自我時光」，⁵⁴臺灣人陷入複雜的認同情緒中，一些臺灣紳商於是主張與日本在

臺力量合作，建立一個以臺灣為主體的國家，此即為一般通稱的「八一五臺獨」事件，⁵⁵但因安藤總督的壓制而未成。⁵⁶然而實際上，類似性質的事件從日本投降日起，臺灣各地皆有所聞，包括有知識青年要求建立自治政府，⁵⁷新竹州會議員黃維生等人提出臺獨請願，甚至有人要求臺灣成為日本的租借地。⁵⁸凡此種種，皆可見臺獨認同在戰後初期就算不是主流，但顯然未必全無政治市場；「八一五臺獨」及國民黨政府來臺前各地的臺獨跡象，正呈現臺灣主體性之訴求有其潛在發展的空間。

不過這與當時多數臺灣人熱烈歡迎「祖國」前來接收所揚起之熾盛的中國認同相比，或許顯得有點反潮流。但無論如何，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總算是一種解放，所以無論原本的政治路線為何，大多數的臺灣人多少感受到當家作主的欣喜，⁵⁹瞬間伴著中華民國晉身四大強國之一，有種不必再給「臭狗仔」（日本人）管的快感。⁶⁰狂喜者更有之，例如林茂生在得知日本投降後，喜悅之情難以抑制，在自己家中就像孩童般邊跳邊叫著：「咱贏了！咱贏了！」；⁶¹樂極生悲的也有，例如長老教會黃武東牧師的父親甚至因為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過度興奮而於次日腦溢血爆發。⁶²

54 此出自陳逸松之形容；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304。

55 該案判決書見：《臺灣新生報》，1947年7月30日。

56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年），頁666-668。

57 〈大詔渙發後における島内治安狀況並び警察措置（第一報）〉，蘇瑤崇主編，《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6年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2004年），頁128-129。

58 〈大詔渙發後における島内治安狀況並び警察措置（第二報）〉，蘇瑤崇主編，《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6年終戰資料集》，頁146-147。

59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頁294。

60 林忠勝編著，《劉盛烈回憶錄》（臺北：前衛，2005年），頁74-45；廖欽福口述，林忠勝撰述，《廖欽福回憶錄》（臺北：前衛，2005年），頁145。

61 劉秀華口述，李筱峰訪問，1996年4月10日；李筱峰，《林茂生·陳焯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129

62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臺北：前衛，1988年），頁151。

51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74。

52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頁151。

53 《臺灣新報》，1945年8月24日，版1。

這番對日本敗降喜悅者，該如何解釋臺灣前不久尙懷日本認同之熾熱呢？林茂生如此解釋：

人有人格，人格是目的，而我輩對於帝國主義之國家，是一手段而已，非目的也。是一機器而已，無人格也。彼等待我以機械，以手段，故我之人格，為生存起見，不得不分裂，分裂便不是自然人，欲啼不能，欲啼不得，此也。不能講老實話亦此也。……從來之所謂國家者，偽國家也。明知其偽，而不得不承認之，此島內同胞五十年來之忍所不可忍者。……今也復到我父祖五千年來之國家，復到存明抗清之鄭成功之國家與四萬萬同胞，同心同德，同一歷史，同一法制，同一語言，同一傳統之真國家。此亦吾人自茲以往，不得不鞠躬盡瘁，努力服務之真國家也。⁶³

林茂生認為之前對日本的認同及對帝國的效忠，乃是一種基於生存下的「人格分裂」，且日本是「偽國家」，今日的中國方是「真國家」，才是其可以展現其真認同及真效忠的對象。然而，林氏所述之其在日治下的人格分裂或許有其道理，但林只想到過去的分裂，卻沒有反思今日所面對的新變局，難道就不會是另一次的人格分裂？總之，在臺灣人未能建立有別於中華民族意識的臺灣認同前，臺灣人的漢族意識便埋沒在中國認同裡。⁶⁴簡言之，無論是之前的日本認同或是戰後初期的中國認同，基本上皆為臺灣主體性無從建立的表徵。

因此，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尙未抵臺之前，全臺普遍充滿期待的喜悅，各地有人積極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紛紛架設歡迎用之光復

的彩門、門聯、橫彩、紅燈，期待國民黨政府軍隊的來臨，戰時黑暗的影子被一掃而光，到處洋溢著一片明朗的新氣象。⁶⁵1945年10月10日，臺灣人首次迎接中華民國的雙十節，以林獻堂為代表，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出擁載的電文：「欣逢國慶，萬民歡騰，臺省光復，端賴鈞座雄圖遠略，暨政府諸公，國軍將士努力奮鬥，登我民於衽席，拯臺灣於水火，凡我臺胞，同心感載。」⁶⁶在慶祝大典上，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升上高掛著，大家齊唱國歌，眾人感動落淚。⁶⁷連過去親日的御用臺灣人也搖身一變，拋棄「天皇陛下」、「皇民奉公會」等，開始大談「中華民族」、「三民主義」，有些人還冒充抗日份子，在各地開始組織所謂「歡迎祖國籌備會」，⁶⁸讓一些「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員看不下去，遂在臺北街頭張貼「歡迎陳儀長官蒞臺主政，要求御用紳士退場反省」之標語，譴責其投機。⁶⁹

終於，眾人所期待的「祖國」於1945年10月17日抵臺，不過，臺灣人第一眼的祖國印象卻是裝備破舊，衣衫襤褸，令人難以卒睹的第七十軍。於此情境下，臺灣人倒寧願以「國軍之一部分，意氣揚揚登陸，基隆市民歡呼若狂。在熱烈情況下踏印其第一步，尤如離別51年之兄弟，重新會見極擁一樣，其親愛情況言語所不能表現者。」⁷⁰來描述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有些臺灣人甚至天真地以「因為中國地大，抗戰中為訓練長途征伐，綁腿裡包著鉛錘所致」⁷¹來為政府軍的窘態辯解，因為此刻濃烈的中國認同

63 《前鋒》第一期「光復紀念號」，1945年10月25日；李筱峰，《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時代》，頁135-136。

64 黃昭堂，《臺灣那想那利斯文》，頁17-18。

65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1989年），頁163。

66 〈臺灣省國慶慶祝大會暨臺胞代表林獻堂等致蔣主席電：民國三十四年自臺北發〉，秦孝儀主編，《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年），頁191。

67 後來成為日本臺獨領導者的王育德，當時也曾感動落淚；王育德著，吳瑞雲譯，《王育德自傳：出生至二二八後脫出臺灣》（臺北：前衛，2002年），頁245。

68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頁742。

69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頁302。

70 《民報》，1945年10月18日，版1。

71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頁153。

可以遮蓋這一切的難堪。⁷²在臺灣人的善意溫情氣氛裡，同年10月24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抵臺。臺灣人興奮地表示：「臺灣光復了，日本人再也不能壓迫我們了，大家已經親眼看見了來自我們祖國的長官，他給我們帶來了自由，更帶來了溫暖。」⁷³充滿中國認同的熾熱與期待。

然而，在某些中國人的眼中，臺灣在歷經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以及與中國的分離之後，已經是「不完整」的中國人；⁷⁴所以，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完全信任這些「新中國人」，甚至認為經由日本人而接受近代化洗禮的臺灣人，是長期以來被剝奪了承受中國文化薰陶的苦難同胞，並且由於浸染於日本文化過久，在道德上已經受到了毒害。⁷⁵在這種偏見之下，當1946年8月一群臺灣人組成「臺灣光復致敬團」，準備前去中國大陸向蔣介石表達臺灣人心悅誠服的中國認同時，⁷⁶陳儀之長官公署即開出下列條件：

一、不許做過日本貴族院議員的林獻堂出任團長；二、不許曾受長官公署拘留過的臺紳陳炳做團員；三、必須由臺北直赴南京，不得在上海停留及先接受臺灣人團體的招待；四、不得上廬山見蔣介石；五、不必前往西安祭黃陵。⁷⁷

72 在柯遠芬的解讀下，臺灣人的溫情表現似乎不是那麼真誠，而是對未來命運的徬徨；柯遠芬認為：「有些人哭了。哭的原因不是因為國家可憐，卻能打敗日本，而是因為將來自己的命運即將和窮困的祖國相同，從此對內地人有點看不起。」；賴澤涵、許雪姬主訪，許雪姬紀錄，〈柯遠芬先生訪問紀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一)》(1992年2月)，頁2。

73 《臺灣新生報》，1945年10月25日。

74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2006年)，頁62。

75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1995年)，頁85。

76 該團由林獻堂代表發言：「擬遣往西安，謁黃帝陵，拜告以臺灣六百萬炎黃子孫，二千三百餘方里版圖已歸祖國。」、「應知臺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六百五十萬臺胞，不但在敵人統治下無時或忘祖國，對於祖國數十年來的內憂外患尤極關切。」；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林獻堂先生追思錄》(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年)，頁79-80。

77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頁301。

不只潑了這些臺灣人之中國認同的一盆冷水，特別是對林獻堂、陳炳等人的針對性與敵意，無疑是對當事人莫大的猜忌和羞辱。不惟如此，戰時臺灣與日本屬於同一陣營的歷史經驗也被清算，臺灣人不只被當成日軍劫掠中國的共犯，⁷⁸連在戰後初期的國籍認定處理上，臺灣人也與朝鮮人待遇一樣，被以「敵僑」看待，包括其財產亦曾一度納入「敵產」處理。⁷⁹

於此情況下，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的當務之急，便是如何將新納入中華民國的「非國民」——「日本化的臺灣人」予以「國民化」；換言之，即是如何再度建立臺灣人的國家意識與國民意識，儘快使臺灣「中國化」、臺灣人「中國人化」。⁸⁰然則，對於臺灣人來說，他們經歷了一個國民身分的轉移，從原來的日本國民，變成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對多數臺灣人是陌生的，所以面臨了重新學做中國人的處境。⁸¹實際上，臺灣人對中國認同的重塑或重建，初始時所抱持的態度是充分配合及熱烈響應，例如1946年藝文界所舉辦的第一屆省展，許多臺灣知名藝術家所展出的作品中便充斥著「振興民族」、「孔子祭」、「還我河山」、「紀念光復」、「國父遺像」等繪畫與雕塑作品。而且這類題材並非硬性規定，大部分的藝術家可謂直接反映臺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華民族，作自己主人的興奮感。⁸²

另一方面，同年的6月16日，結合了當年官、民、商、學等各界名流數百人更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亦重申對中國文化的完全認同，以消除日本認同的文化元素，其機關誌《臺灣文化》中有言：

78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79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59。

80 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臺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一〉，收於張炎憲、陳美容、楊雅慧合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年)，頁93。

81 楊聰榮，〈從民族國家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第四屆臺灣新生代論文研討會》，(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92年)，頁2-3。

82 顏娟英，〈戰後初期臺灣美術的反省與幻滅〉，收於張炎憲、陳美容、楊雅慧合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80。

現在、臺灣已重歸祖國。臺胞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要使臺灣真正地成為中國的領土，臺胞真正地成為中國的國民，那麼，立即糾正現有的一切日化現象，和日人所遺留的一切日化思想，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這一個掃清日化氣氛，重建祖國自由氣息的事業，就是重建臺灣文化的工作。我們必須在新臺灣的土地上，樹立起一如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根基，使臺灣文化的繁榮，能夠毫無二致地與內地各省並駕齊驅，這才是我們對於未來臺灣文化的憧憬與希望。⁸³

包括一些指標性的臺灣精英，例如蔣渭川也是全力投入「中國化」的工作當中，從研究三民主義、學習國語，到傳授民眾唱國歌，⁸⁴務要在思想及行動上努力擺脫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其重點工作在強調「三民主義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中國文化教育」，特別是提倡「國語教育」。概言之，其主要原則就是「以去日本化（de-Japanification）來達成中國化」，⁸⁵設法從臺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去除和日本有關的記憶，以及任何有日本象徵意味的東西，俾使中國認同可以取得獨尊地位。

中國認同的優越地位，代表的意涵不僅僅是臺灣主體性的徹底繳械，還包括代表中國認同象徵的外省人在臺權力結構的寡占；因為臺灣人必須全然服膺中國認同，所以外省人有能力可以「作之師」，甚至「作之君」亦不為過。種種諸如「臺灣人沒有政治人才」、「臺灣人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經二十年的『訓練』才行」⁸⁶之話語，講得義正辭嚴、理所當然。或是挾著說「國語」的優越感，以殖

民的心態，做為壓迫和不起用臺灣人的藉口。⁸⁷偏偏一些派任赴臺的外省人，原就抱著升官發財的心情和目的前來，在工作能力和作風方面，又大多貪污無能。加上戰後國共惡鬥方酣，陳儀政府所治下的臺灣，其所形成的國家資本支配體制，竟變成到處掠取臺灣經濟剩餘而注入到中國內戰的龐大經濟裝置，⁸⁸使臺灣民生蒙受莫大的傷痛。

戰後未及一年，臺灣處處已可見民生凋敝的景象，以柯臺山回臺見聞為例，當其於1946年3月回鄉時，沿途看見火車道旁的甘蔗苗全被割下來，公營事業亦呈停頓狀態；家鄉青年男女皆意志消沉，失去該有的朝氣。愈往南行，不滿當局的聲浪持續高漲，有人說要炒豬肝（官）吃（陳儀）；從「希望」到「失望」到「絕望」，是當時普遍的口號。⁸⁹臺灣人這才看清楚「祖國」的真面目，陳儀只是以征服者姿態來君臨臺灣，劫收臺灣的一個新殖民政權而已。臺灣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嚴冬之後竟然是一個更加寒冷的冬天。⁹⁰不旋踵，臺灣與祖國的蜜月期不再，臺灣人面對現實處境的艱難，其所日益積累的怨氣與不滿，已非祖國之情感號召或共赴國難的呼喚所可掩蓋；漸漸地，臺灣人對中國不再存有太多綺想，曾經熱烈的中國認同亦搖搖欲墜。

前述大力張揚其中國認同的林茂生，於1946年5月底已經對當局統治深感不滿，而慨歎臺灣沒有如同朝鮮一般，有位李承晚，可以使獨立建國之路較為平坦順暢；他強調，因為臺灣少了一個李承晚，所以讓臺灣在一夕之間又淪為二等國民，處處遭到中國佔領軍不合理的欺壓。⁹¹當同年10月下旬蔣介石親臨臺灣視察，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臺」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

83 林紫貴，〈重建臺灣文化〉，《臺灣文化》復刻版上冊，1卷1期，頁17。

84 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1996年），頁200-201。

85 楊聰榮，〈從民族國家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頁3。

86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臺灣二二八事件見聞紀略》），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1991年），頁8。

87 廖欽福口述，林忠勝撰述，《廖欽福回憶錄》，頁167。

88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等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1993年），頁29。

89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8。

90 廖欽福口述，林忠勝撰述，《廖欽福回憶錄》，頁151。

91 林宗義口述，〈我的父親林茂生〉，收於胡慧玲，《島嶼愛戀》（臺北：玉山社，1995年），頁16-17。

主席甫臨本省，再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臺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臺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⁹²

顯而易見，這樣含蓄的建言，終究難以引來中央的正視，而只能徒呼負負。

在中國認同持續探底的情勢下，有些臺灣人於是將希望寄託於他國或國際力量上。1946年6月黃紀男透過美國駐臺領事葛超智（George Kerr），代轉美國政府及聯合國，倡議臺灣應該獨立，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並成立有如瑞士一樣的永久中立國。⁹³這是戰後臺灣復歸中國後，第一次臺獨對國際的公開呼聲。同年8月下旬，葛超智收到臺灣人的投書：

美國是引導我們，不，不祇我們，而是引導全世界人類的神。而現在我們的政府則是奴役我們，將我民族導致地獄的亡國政府。……光復當初，我們歡迎蔣主席手下的到來，但如今我們正宛如趕走了狗（指日本），而迎接豬公進入臺灣。……如果解剖我們六百七十萬同胞的話，我們內心首先一定緊向著美國，其次則是向著同為黃色人種的日本。⁹⁴

美國駐臺領事館接連收到的投書，顯示已有不少臺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統治充滿不耐，不只認為中國遠不及美國，甚至連已經戰敗的日本都不如。有臺灣人將美國視之為「神」，雖然極度諂媚，但這何嘗不是一種希求脫離中國統治，卻無人可援而不得不請求上帝幫助的徬徨之語。

92 〈迎迓蔣主席蒞臺〉，《民報》，1946年10月22日。

93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獨家，1991年），頁146。

94 原信件以日文書寫，譯文見：鄭純宜主編，《被出賣的臺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臺北：臺北228紀念館，1999年），頁57。

臺灣人的徬徨，在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的觀點，已如同德、法邊界的亞爾薩斯、洛林兩地一般，難脫被列強宰制的宿命，為脫離這項歷史悲運，廖文奎另提出臺灣除了選擇「薩丁尼亞模式」統一中國之外，或許另可採「愛爾蘭模式」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⁹⁵言下之意，廖文奎與一些臺灣人一般，已不再視與中國統一為臺灣前途的唯一選項。隨後1947年1月3日，廖氏兄弟更在演講會中，抨擊陳儀政府之腐敗，並提出「臺灣人治臺」，以及「臺灣應在中國聯邦的體制下完全自治」之呼籲。⁹⁶

伴隨著中國認同之走下坡，臺灣主體性遂逐漸凸顯，不僅充斥前述公投、國際介入或臺灣自治的聲浪，否定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也成為此刻的訴求要點。1947年2月中旬，美國駐臺領事館收到臺灣人要求轉交馬歇爾將軍的請願書，表示：

我們注意到臺灣人的國籍在聯合國中仍是一個未解的問題，以此不動搖的事實，難道我們還要服從他們的命令去自掘墳墓嗎？我們害怕聯合國會把我們臺灣人看成與中國人一樣，……以革命的槍枝及原子彈反對昏庸的政府應以筆做開始，加上聯合國對我們的同情以及友善的干涉中國當局將是唯一可走的路，因為在聯合國和日本的和約締結之前，臺灣還未完全歸還給中國。⁹⁷

在上海媒體界所接收到臺灣訊息也是發現，臺灣人對本身是否是「中國國民」已產生動搖：

95 張炎憲，〈戰後初期臺獨主張產生的探討〉，《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等，1992年），頁288-289；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總論頁6。

96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144。

97 葛超智（George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臺北：前衛，1996年），頁251。

為謀臺灣人的福利，為謀整個民族將來的繁榮，我們的國籍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身，是由臺灣人民的總民意來決定。⁹⁸

臺灣的中國認同每況愈下，從興盛光景走到衰退境遇竟不足兩年；臺灣人從初期的競相「中國化」，至此一變為質疑自身的中國身分。有些臺灣人寄望聯合國或國際的干涉，甚者尋求一條告別中國認同的道路。1947年1月省參議員郭國基公開演說：

元朝異族不過數十萬人，侵入中國為主執政八十餘年；清朝滿族不過八百萬人，侵入中國為主二百餘年。由此可見中國民族性之懦弱。我臺灣民族，現有六百餘萬人，自元明清歷代以來，均不願受中國統治，應有抵抗事實，望各青年均能立志為臺灣獨立而努力，勿再受中國之管轄。⁹⁹

郭國基的言論，顯然把「臺灣民族」從「中國民族」裡抽離，並斷然使臺灣認同從日治以降與漢民族、中華民族、中國人等糾纏不清認同泥沼中脫出，臺灣人或臺灣民族的認同概念，取得了有別於中國認同的主體性。「臺灣人」與「中國人」既被視為對立的兩個不同民族，以致「你們中國人，我們臺灣人」這類話也逐漸成了各界群眾中流行的口語。¹⁰⁰在民間的接觸中，有人觀察到，臺灣人具有強烈的自尊心，而外省人又抱著特殊的優越感（譬如會說「國語」），¹⁰¹由於這兩種不同意識互相對抗結

98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臺灣局面〉，收於陳芳明編，《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臺北：二二八和平促進會，1991年）頁16。

99 〈保密局呈蔣主席2月26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63。

100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事件的前因〉（《臺灣二二八事件見聞紀略》），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8。

101 廖欽福口述，林忠勝撰述，《廖欽福回憶錄》，頁167。

果，遂使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¹⁰²執政當局的腐敗作為，非但無法弭平對立衝突，反倒堆起仇恨的柴火，成為壓倒中國認同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時序已經來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夕了。

四、臺獨¹⁰³認同¹⁰⁴之再起

1947年2月27日的偶發事件，隔天（28日）迅疾引爆全臺戰後以來所累積的怒火；「二二八事件」代表著一種原本被高度吹捧之中國認同的破滅，而期待越高，破滅後產生的反擊力道便越強。首當其衝的，是全臺各地與中國有關的符號、標的物：2月28日當天，臺北車站前之中國旅行社與其它冠有「中國」的招牌，「中國」二字皆被被打掉。¹⁰⁵不惟如此，此對中國認同之反噬，還以攻擊外省人為宣洩出口；從事件初起，便發生毆打外省人、¹⁰⁶張貼「打死中國人」標語的情事；¹⁰⁷有人在路上毆打外省人，聲稱是要打死中國人，¹⁰⁸使得一些外省人紛紛躲避至美國駐臺北的領事館。¹⁰⁹報社和廣播電臺也在「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控制下發表排中言

102 唐賢龍，〈臺灣事變的原因〉（《臺灣事變內幕記》），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30。

103 概言之，「臺獨」(Taidu)可定義為「臺灣主體性確立的歷史過程」；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年），頁520。關於「臺獨」之更多意涵面向，可參考筆者「臺獨進程五階段」之討論；陳佳宏，〈「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之歷史觀察〉，《2006年林本源中華文化基金會年會暨臺灣史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年12月1日。

104 本文的「臺獨認同」係指涉以臺灣為主體思考，將臺灣視為最終、最上位的認同依歸。依「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之定義，至少是第三階段「主觀的臺獨」以上的進程。

105 〈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林衡道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口述歷史》第2期（1991年2月1日），頁227。

106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柯遠芬暨彭孟緝回憶錄》（1992年2月），頁12。

107 莊嘉農，《憤怒的臺灣》，頁160。

10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臺灣事變處理辦法」案〉，收於魏永竹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376。

109 〈駐中國大使館公使巴特華茲致國務卿電(414號)：1947年3月1日晚11時於南京〉，收於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臺北：玉山社，2002年），頁40-41。

論，以極富煽動性的語調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¹¹⁰顯見臺灣此刻幾乎籠罩在一股反中國的氣氛中。

於是全臺各地充滿著尋找「中國人—外省人」的報復性行動，有從穿著、外型或動作分辨，但更多是用語言（主流為福佬話或日語）來區分敵我，導致牽連一些包括客家人在內的無辜受害者；¹¹¹這股打殺外省人的狂潮，被認為如同鼠疫霍亂一樣蔓延開來，¹¹²讓臺北被形容成一座「恐怖的死城」。¹¹³依據官方的統計，事件期間全臺各縣市幾乎都發生外省人遭攻擊事件，或遭搶奪財物、¹¹⁴拘禁，¹¹⁵尤有甚者，在高雄市還發生七百餘名外省人士被拘，並強充作沙包，以禦槍彈的情事。¹¹⁶其它諸如受傷的外省人到本省私人醫院求診遭拒，或外省孕婦被痛毆、¹¹⁷外省婦女遭強姦、外省小孩被殘害¹¹⁸等種種不人道對待之說法皆始終存在。

令人遺憾的是，此長久被壓抑、被漠視的臺灣主體性之重新展現，竟是以一種攻擊、破壞性的方式，對中國認同作徹底的總清算，且被認為有

其正當合理性。¹¹⁹誠然這類負面舉動，並非有系統、組織性的報復行為，有些還是雙方的認知差距所導致的誤解。¹²⁰而且這些族群衝突會升高成暴力事件，主因應在於國家功能脆弱，無法提供基本服務、維持治安，並且有效公正執行法治所致，¹²¹卻連帶使一些無辜的外省人成為這股怨忿的替罪羔羊。然而，國民黨治臺官員並不會深自檢討本身治理之過錯，其僅過濾出他想要獲得的資訊，而直把焦點鎖定在「外省人死傷相當慘烈，¹²²甚至比臺灣人還多」¹²³這類誇大的危機中；彭孟緝還自認「已成為高雄地區外省人在死亡掙扎線上唯一求救的對象」。¹²⁴另一方面，彭同時也發覺，依據臺灣人口口聲聲「你們」「我們」云云，早就已經與外省人—中國人分出彼此、畫出界線，而處於完全對立的態勢。¹²⁵

不容諱言，這樣的對立，反照戰後以來臺、中雙方之間累積的仇視與鄙視，加上臺灣人在事件初期位居上風之假象，臺灣精英們乃將這股動能化為實際的政治行動；他們將日治時期塵封已久之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自治」理想再度標舉出來，與國民黨政府官員展開政治較量。藉由「緝煙

110 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252。

111 黃華昌指出：「有些不會福佬話的客家人，因躊躇而不能立即回答，也被誤認為外省人而挨揍，後來用日語怒罵才知道是臺灣人。像這種例子也不少」；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2004年），頁203。客家籍戴國輝被迫唱日本軍歌以證明其臺灣籍身分；戴國輝，〈自序〉，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序頁3。

112 〈王康的回憶〉，收於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臺北：稻鄉，1989年），頁212。

113 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節錄）〉，頁65。

11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制「二二八」事件各縣市暴動情形簡表〉，收於王曉波編，《國民黨與二二八》（臺北：海峽學術，2004年），頁349-352、361；〈臺中縣三二事件員林區轄內參加「暴動奸徒」名冊〉，收於呂興忠編撰，《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4年），頁119-132。〈為呈報查警員張溪山、邱樹位等關係二二八事變情形由〉，《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前揭，頁97-99。

1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制「二二八」事件各縣市暴動情形簡表〉，頁347-350、356-357。

11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制「二二八」事件各縣市暴動情形簡表〉，頁348；屠申虹，〈介紹「二二八事變親歷記」〉，收於李敖，《二二八研究續集》（臺北：李敖，1989年），頁396。

117 〈王康的回憶〉，頁212。

118 戴國輝，〈自序〉，序頁3；〈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事件紀要」〉，《二二八事件文件續錄》，頁516。

119 林茂生就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他們已經沒有其他方法來表達或發洩他們的憤怒。」林宗義著，慧文譯，〈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收於胡慧玲等編輯，《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實錄》（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年），頁112。

120 對此外省人遭到拘禁之說，楊熾昌提出解釋：「市參議員翁金護，他為了保護外省人，就在臺南運河邊攔外省船，將外省人安置在今康樂街（日據時的新町松金樓），既安排住宿，又準備膳食，這樣的處理並沒有好報，在軍隊進來後，翁金護已監禁外省人的罪名被捕，正應了閩南語的俗語說『好心給雷打死』」；許雪姬訪問紀錄，〈楊熾昌先生訪問記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二)》（1992年2月），頁2。

121 吳叡人，〈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3月23日，電子版。

122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頁13。

123 賴澤涵訪問，〈彭孟緝將軍訪問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1992年2月），頁2。

124 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柯遠芬暨彭孟緝回憶錄》（1992年2月），頁62。

125 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頁59。

血案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之機，隨即在全臺17個縣市成立分會，並於3月5日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規定其組織以全體委員所組之機構為最高機構，其決議交由常務委員會執行，常務委員會下置處理局與政務局，其下分別再設各組。¹²⁶按其層層疊疊、蔚然可觀的組織架構，儼然是個頗具規模的「臨時政府」；¹²⁷而其組織成員也被當局認定參雜共產黨及臺獨份子，¹²⁸從事叛國圖謀。

處委會在全臺各地組織本身的武裝力量，一時形成頗大的聲勢；名義上聲稱為了恢復二二七以前的常態，¹²⁹實際上是要做處委會的後援，增加與陳儀談判的籌碼。¹³⁰所以從3月3日開始，處委會透過廣播，號召臺灣青年團結一致徹底抗爭。接著下令前臺籍日本各軍種集合在指定地點，彷彿向復員軍人軍屬，再度下達召集令；¹³¹並將前日本軍人出身者編成若櫻隊，軍屬出身者，以戰區別，編成海南隊、菲律賓隊、澳洲隊（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戰區）等，聯合組成「鄉土自衛隊」，隸屬蔣渭川指揮。¹³²同時間，召開臨時治安委員會，成立「忠義服務隊」負責維持治安，由許德輝擔任隊長兼治安組組長，並託學生青年集團協助。¹³³「忠義服務隊」遂代替警察，在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與交通；其下設「別動隊」，與「鄉土自衛隊」一起行動，很快就佔領設在太平町、近臺北橋的謝娥醫院，成立作戰本部。¹³⁴3月7日蔣渭川在太平町三民書局召集各隊隊長進行作戰會

議，討論如何救援嘉義機場被圍的青年，¹³⁵會中林正亨聲稱握有近2,000名的青壯年，也有步槍、手槍、兩臺的機關槍及數千顆的手榴彈，要求蔣渭川號召合作襲擊軍倉庫，奪取所有武器。¹³⁶

表面上的掌控全局，¹³⁷民軍情勢似乎一片大好，使處委會信心大增，而在3月7日通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暨十項要求，不過，隨即遭到陳儀當局的嚴拒。固然處委會諸人，在此刻沒有喊出明確尋求臺獨的口號，但在全臺各地召集這麼多的武裝力量，如何不引人聯想臺灣人企圖憑藉武力脫離中國而獨立。況且，處理大綱首先便要求「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¹³⁸很容易被解讀為欲把國民黨政府繳械，全面屏除中國的統治力量，甚至是向中國宣戰。¹³⁹無怪乎有論者認為：「『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叛變如果成功，則臺灣將會從高度自治走向分離獨立，這是很自然的趨勢。」¹⁴⁰

其實在處委會正式成立前夕，便已經向美國駐臺領事館提出一份計有807名成員代表和141個簽名的陳情書，其結論訴求：「改革臺灣省政府的捷徑，全在於聯合國共同管理臺灣，並中斷臺灣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及經濟關係，直到臺灣獨立。」¹⁴¹顯示處委會並不以表面聲稱的全面或高度自治為滿足，其隱藏的政治底牌則是臺獨認同，只是尚未到可以跟國民黨政府當局完全攤牌的局面，所以檯面上依然以自治為主要訴求。

126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收於鄧孔昭，《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261-263。

127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臺北：時報，1995年），頁167。

128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頁16、18。

129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於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頁119。

130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09-210。

131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09。

132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09。

133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頁119。

134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09-210。

135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14-215。

136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頁125。

137 有作戰經驗的黃華昌並不看好處委會的武裝實力：「細部的作戰會議宛如中央市場的喊叫拍賣，或婦女湊在井邊的閒聊，吵吵嚷嚷一陣。看樣子，不過是一堆烏合之眾罷了。」；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等翻譯，《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215。

138 〈處委會闡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廣播處理大綱〉，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273。

139 何容，〈呼冤〉，收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臺北：海峽學術，2002年），頁91。

140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頁161-162。

141 〈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致國務卿電（439號）：1947年3月4日下午1時於南京〉，收於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頁46。

不過，當處理大綱提出，不惟已逾國民黨政府容忍之底線，更被視為「叛國陰謀已昭然若揭矣」。¹⁴²當局也將處委會領導者蔣渭川、王添灯等人視為「大臺灣主義」者，認定他們在對臺灣人作煽動宣傳。¹⁴³連在南京蔣介石主席都認為此事件之性質已非單純之政治改革問題，而實有叛國及奪取政權之重大陰謀夾雜其間。¹⁴⁴因為，只要是突顯臺灣主體性之作為，無論是「臺人治臺」、「高度自治」或進階的臺獨認同，對國民黨政府當局而言殊無二致，都是臺灣企圖脫離中國而追求獨立的表現。¹⁴⁵

因此，為重新奪回中國對臺灣的實質控制，以及壓制臺獨認同之武裝行動隨即展開。從1947年3月9日國民黨政府的增援部隊進入臺北始，有任何程度的臺獨認同之企圖，在軍事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都面臨著一敗塗地的危機。處委會以下的臺灣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許多人紛紛被以臺獨叛國等罪行起訴或逕行就地正法，¹⁴⁶而被以魯莽、殘暴手段加害之無辜受難者更不計其數。

這樣強勢斷然的鎮壓舉措，表面上確實有效壓制臺灣主體性之繼續發展，但卻無法將曾經熾熱的中國認同再度燃起；經過二二八事件之衝擊，許多臺灣人終於真正地體驗了原來「中國」就是這麼一回事，連帶對於「國家」產生根本的迷惑，而精神領域中的「文化祖國」則虛位化；¹⁴⁷中國認同對臺灣人未免太過沉重。因此，為擺脫這個沉重的認同枷鎖，臺灣人希望由血統上斬斷與中國的牽扯，以彭清靠為例，他就以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¹⁴⁸廖文毅則直接徹底否定中國人（漢人）在臺灣人血統上的專屬地

位，而聲稱臺灣人包含馬來、日本、拉丁、條頓諸民族的血統（臺灣民族混血論）。¹⁴⁹史明更完全否定臺灣人與中國人在血緣與文化傳統上有共同性，而認為頂多只有人類學研究的意義。¹⁵⁰廖、史兩人的觀點，可以代表早期海外臺獨認同者極端的「血統文化論」或「原生論」。

固然臺灣主體性及臺獨認同在二二八事件後再次遭到強勢狙擊，且從1950年代之後的白色恐怖、黨國威權戒嚴體制、中國法統教條層層之壓制下，潛藏島內的臺獨認同或與匪諜案糾纏，或是根本瀕臨完全窒息的狀態。然而，這股臺獨認同的力量卻與二二八受難者之靈形成連結、產生化學效應，成為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的一大歷史動能。因臺獨認同而入獄27年的鍾謙順就說道：

我想我們在二二八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使我們徹底醒悟要追求臺灣人真正的自由與幸福，只有臺灣獨立、只有自力建國別無二途。我應該獻身為被人欺負、被人污辱、被人壓迫歧視的臺灣同胞們，提倡臺灣獨立運動。¹⁵¹

戰後臺獨訴求的發軔者黃紀男也自承，二二八事件是加強其臺獨認同與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二二八事件被鎮壓與平息，他對臺獨所抱持的理想未降反升而更加堅定。¹⁵²事件後黃紀男採取積極作為，遞交請願書給來臺視察的魏德邁中將，強調：

二二八事件證明了國民黨無能統治臺灣人的事實，對於如此一個暴虐無道的政權，我們呼籲應賦予臺灣依照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讓臺

142 楊亮功，〈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收於王曉波編，《國民黨與二二八事件》，頁31。

143 〈中統局呈蔣主席3月6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68。

144 〈概述〉，〈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19-20。

145 〈臺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收於陳芳明編，《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年）頁16。

146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頁79-81。

147 李喬，《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頁78-79。

148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5年），頁77。

149 廖文毅，《臺灣民本主義》（東京：臺灣民報社，1956年），頁40。

150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頁440-441。

151 鍾謙順，《煉獄餘生錄：坐獄二十七年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無出版年），頁128。

152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169。

灣人民享有自決之權。¹⁵³

二二八事件後，倖存的臺灣精英揭櫫「自決」，不再遮遮掩掩地如事件前以「自治」與國民黨政府虛與委蛇。廖文毅更直陳：

1947年二二八革命之後，臺灣人聯邦自治的幻想逐漸消失，臺灣是臺灣的構想急速成長，形成臺灣獨立的主張。¹⁵⁴

這樣的「自決」訴求，不僅是與中國認同的決裂，也是臺獨認同的再次出發，而無疑以二二八事件為其轉折點。彭明敏亦認為：

二二八之前，人民對政府的印象儘管感到不滿，但至少還認為這只是陳儀地方政府的腐敗、無能，而中央政府的蔣介石是偉大的。因此，人民有主張要向中央反映地方問題。而在二二八發生後，臺灣人才普遍以為包括蔣介石在內都是不可信任的。這是臺灣命運重要的分水嶺。二二八之後，臺灣人對中國的失望，進而認為要決定自己的前途。人們感到中國是外國，而且是野蠻、落後、封建、腐敗的。以後的臺灣獨立運動可以說是開了源頭，日趨強化與深刻。¹⁵⁵

這個臺獨運動的源頭便由廖文毅、黃紀男等人於海外開啓。一如過往對白色祖國的眷戀，這些海外臺灣人也曾經猶疑於紅色祖國與臺獨認同之間。在香港，海外臺共放棄（失去）臺灣主體性而回歸至共產中國，連帶

153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169。

154 廖文毅，《臺灣民主主義》，頁110。

155 〈彭明敏先生口述記錄〉，《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年），頁162-163。

156 臺共背景者，一向堅決否認二二八事件與臺獨的任何牽連；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頁78-79。

其也否定二二八對臺獨認同的特殊歷史意義；¹⁵⁶但堅持臺獨認同者則展開了日後數十年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與國民黨政府鬥爭不已。

儘管海外臺獨迭有分合，不過長期以來二二八事件始終是海外臺獨認同最重要的鬥志來源，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暨十項要求，就被海外臺獨視為「臺灣人的人權宣言」，¹⁵⁷等同於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及美國獨立的〈獨立宣言〉。臺獨團體常將許多重要行事排在2月28日舉行，顯示二二八這個日子（或稱為「圖騰」、「神主牌」）一方面是臺獨認同者的「國殤日」，¹⁵⁸另一方面又如同臺灣「建國紀念日」般顯要（臺灣的第三次獨立建國），¹⁵⁹遙寄著臺獨之魂。海外臺獨團體中最具規模的「臺獨聯盟」（WUFI）進一步闡釋二二八事件在臺灣建國使命中之歷史意義：

二次大戰後，當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之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受“大民族沙文主義”的作祟，竟開門揖盜迎接“祖國”的軍隊。結果引發了驚天動地的二·二八鬥爭。這場鬥爭終於確定了數百年臺灣人民革命的結論：即外來政權都是壓迫的，都是剝削的，都是反動的。咱要建立合理的新社會，消除壓迫，除了獨立建國當家作主，別無二途。知識份子終於覺悟地丟下“大民族沙文主義”的包袱，和人民站在革命的一邊，為獨立建國當家作主的偉大理想並肩作戰。¹⁶⁰

157 〈臺灣人的人權宣言！32條要求〉，《臺灣青年》第6號（1961年2月20日），頁9。

158 1969年2月28日「全美臺灣獨立聯盟」（UFAI）便曾發表〈2·28國殤紀念日臺灣民族對美宣言〉（Formosan Nation Speaks Its Heart on February 28th Memorial Day）；《臺灣青年》第101號（1969年4月5日），頁25-29。

159 日本臺獨廖文毅系統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是繼1661年的鄭王朝及1895年臺灣民主國後，臺灣第三次的獨立建國，只是沒有完成，所以廖文毅才承接這場臺灣建國的二二八使命。〈臺灣共和國獨立宣言〉，《臺灣民報》，1956年2月28日。

160 張燦鑒，〈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步前進〉，收於陳正修、王康陸、黃嘉光等合編，《臺灣獨立運動三十年：張燦鑒選集》（臺北：前衛，1991年），頁378。

當海外臺獨面臨國民黨政府的不斷追勦，以及內外主客觀的困境時，二二八事件便成了堅定臺獨認同之精神力量，而不能屈服在國民黨政府的威勢下：

咱要時時以二二八的教訓來警惕自己：絕不能和反動集團妥協，絕不能鬆懈實力鬥爭……讓咱這樣地武裝自己，撐起二二八的大旗，向獨立建國當家作主的革命邁步前進！」¹⁶¹「二二八的歷史、二二八的教訓、二二八的啟示，一直活在臺灣人的內心深處。咱們不但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反而因為紀念二二八，一年比一年更加鼓舞，更加打拼，要將這個悲慘的日子，轉變成臺灣人獨立建國的光榮日子。¹⁶²

相較於海外臺獨始終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奮鬥努力的精神來源與起點，¹⁶³島內由於長期處於戒嚴威權體制的控制，一直要遲至40年後——1987年，才有陳永興、鄭南榕等人突破二二八禁忌，冒著再度繫獄的危險，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¹⁶⁴出錢出力，公開推行一連串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¹⁶⁵隨著二二八事件搬上檯面，以及公開討論和研究，加以解嚴前後臺獨認同在島內亦漸公開化，很多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大部分都具備臺獨認同；¹⁶⁶相對地，其中有些人一談到與中國統一則馬上就會

¹⁶¹ 張燦鏐，〈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步前進〉，頁378-379。

¹⁶² 張燦鏐，〈向獨立建國的目標邁步前進〉，頁391-392。

¹⁶³ 〈2·28事件的意義：戰後臺灣獨立運動的起點〉，《臺灣青年》第196號（1977年2月5日），頁1-5。

¹⁶⁴ 鄭南榕甫出獄便投入二二八紀念工作，他嘗言：「我就是關不住的鄭南榕……我發現今年正好是『二二八』四十週年，我認為這個紀念工作十分重要而且有意義，因此我當下決定，即使再度回籠，我也要出錢出力來加以推動……我們打算長期而持續的進行，到臺灣真正和平為止。」；胡慧玲等編輯，《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實錄》（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91年），頁26。

¹⁶⁵ 陳永興，《拯救臺灣人的心靈》（臺北：前衛，1989年），頁17-46。

浮現二二八夢魘。¹⁶⁷觀其對中國的疑懼與對臺獨的認同，無疑皆啟發自二二八。

五、結語

日治初期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無奈地選擇現實認同，但情感認同上還是遙遙託付於祖國原鄉（清帝國→中國）。由於地理空間或日本政策有意的設限，臺灣人不易親履親證中國土地，所以常常只是將中國視為「概念」而缺乏實體感；中國認同或「祖國意識」正是一種被日本人壓迫下所建構之「集體記憶」衍生出的「歷史共業」，而以漢文化認同為其基礎。¹⁶⁸因此，這種對中國的孺慕之情，充其量只是一種「想像的認同」，甚至是「烏托邦認同」。

到了日治中期，臺灣精英領導社會運動向日本爭取權力主體性時，或者由於本身自信不足，或者日本帝國的力量過於巨大，許多臺灣人常必須援引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與日本抗衡。然而，這類存在概念裡的祖國圖像，畢竟與中國實體差距頗大，臺灣人往往對中國政治的詭譎與深沉，諱莫如深，甚至一無所知。¹⁶⁹因此，除非遠離臺灣，前去中國發展，

¹⁶⁶ 譬如：臺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之子林宗義、林宗光、女兒林詠梅；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之子彭明敏；臺灣金融先驅陳焯之子陳盤谷；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之弟王育德；臺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之子李榮昌、女兒李月美；《臺灣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林界之女林黎彩、女婿廖中山；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之孫張安滿；朴子鎮長張榮宗之女張秋梧；臺灣省參議員王添灯之女王芬芳；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之女郭勝華；臺北市參議會徐春卿之子徐世通；嘉義市畫家陳澄波之子陳重光；《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之女阮美妹；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長廖進平之子廖德政、廖德雄等等；李筱峰，〈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獨立運動〉，收於李旺臺總編輯，《二二八事件新史科學術論文集》（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3年），頁136-138。

¹⁶⁷ 〈王秀琴訪問記錄〉，收於張炎憲主編，《王添灯紀念輯》（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年），頁136。

¹⁶⁸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2000年），頁132。

¹⁶⁹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1920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前揭，頁109。

否則臺灣人歸結還是僅能與日本人合作。

臺灣人在體制內從事社會運動，代表著認同日本對臺灣主權的領有，也因此可以得到一些開明派日人之合作。在這些日人樂觀的期待裡，認為臺灣的特殊歷史背景與身分，足堪擔當日中親善交流的渠道。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之衝突不斷加溫，臺灣人非但溝通橋樑搭建不成，連帶也捲進日中鬥爭的漩渦裡。也許是體驗相同處境的痛楚，有些臺灣人對受壓迫的一方——中國，常常寄予同情，而不免陷入一種「敵我不分」的錯亂認同裡。隨著戰爭的加劇，日本當局自不能容忍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帝國子民懷有貳心，於是在皇民化——日本認同之集體催眠的氣氛中，不惟中國認同頓時散去，戰時的臺灣主體性同等遭受到沉重的壓抑。

二戰的結果，使得臺灣人的完全「日本化」功敗垂成，然後新的中國政府又以極其強勢的姿態君臨臺灣，臺灣主體性不是遭到再次的重擊，便是在中國認同的羽翼遮蓋下而被遺忘。不過，以臺灣各地普遍期待祖國前來的盛情來看，假如國民黨政府之治理能上軌道，得到臺灣民心的認同，那麼，或許中國認同可以順勢在臺灣取得主體地位。未料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翻轉了這股臺灣人的認同歸向，將日治中期以來「自治」的訴求，重新導引至追求臺灣主體性的臺獨認同。

實際上，在1945年以前，臺灣的近代化或現代化經驗主要來自於日本的殖民統治，而中華民國的國家建構過程，並未存在臺灣人的歷史記憶中；臺灣人也沒有親身體會中國民族主義的洪流，除了前述提到概念性的祖國意識或烏托邦式的空想認同外，是談不上什麼中國國家認同。這種歷史的割裂，意味著臺灣和中國朝向形成近代國家掙扎的過程裡、能一起邁進的條件也被割斷分離。¹⁷⁰於是乎，臺灣人就如同「葉公好龍」¹⁷¹般，對

素未謀面的中國充滿著無比的遐想，一旦中國真龍如實降臨，結果反而嚇壞了。所謂「臺灣光復」，正好將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民族意識，一次驗證其中過度天真的「漢民族主義幻想」及「中國民族主義情緒」，¹⁷²但付出的代價則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悲劇；這正是長期以來「臺灣人好中國」的歷史寫照。

過去日中認同之爭鬥，臺灣人曾經同情同處弱勢的中國一方，因為日本人同時壓迫著臺、中兩方；二二八事件後，卻醞釀出臺灣人對中國人的深層憤恨，繼而讓臺灣人重新建構和重新想像了他們與日本之間的殖民關係。¹⁷³有人納悶為何老一輩的臺灣人會懷日、親日，不只因為日治時期是他們童年和青春歲月的記憶，而且也因中國人給他們的經驗太慘烈。當統治者要強加貼上中國人的標籤，拒絕認同臺灣這塊土地與尊重人民的歷史經驗，只有更進一步把這裡的人民推向最自然、最原始最沒有意識形態而同時也是最有意識形態的臺灣人自我認同。¹⁷⁴這就是臺獨認同形成的基礎，一種追求臺灣主體性的歷史認同過程。

翻閱這段臺灣之認同糾葛歷程，可以發現固然臺灣人曾經依違在日中認同之間而時有偏重，但追求臺灣主體性之步伐卻未曾停止，也許有時踱步、有時迂迴，甚至在戰時或戰後初期有倒退的跡象，不過，拉長歷史縱深來看，臺灣主體性之趨勢無疑是向上發展。直到二二八事件後，更堅定許多臺灣人走自己路的決心，而在海外從事臺獨運動，並在解嚴前後與島內民主力量結合，撼動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中國法統結構，也激發了原本曖昧的島內臺獨力量，使得1990年代後臺灣主體性的方向獲得確立，亦使臺獨認同逐漸成為許多臺灣人重要的認同依歸。

170 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頁17。

171 古人葉子高喜歡龍，家裡全用龍來雕飾。天上的龍知道此事，特到葉公家的窗口窺視。葉公見了真龍，卻嚇得面無人色。典出漢·劉向，《新序》，《雜事》。後以「葉公好龍」比喻表裡不一，似是而非的假象；〈葉公好龍〉，教育部，《國語辭典》，電子版；<http://140.111.34.46/dict/>

172 陳俐甫，〈臺灣民族意識發展史研究：到民主主義之路〉，《第四屆臺灣新生代論文研討會》，（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1992年），頁10。

173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頁41。

174 林美容，《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臺北：前衛，1996年），頁89-90。

引用書目

- 《臺灣新生報》，1945年10月25日、1947年7月30日。
《臺灣新報》，1945年8月24日。
《臺灣民報》，1956年2月28日。
《臺灣青年》第6號（1961年2月20日）、第101號（1969年4月5日）、第196號（1977年2月5日）。
《民報》，1945年10月18日、1946年10月22日。
《前鋒》第1期「光復紀念號」，1945年10月25日。
《興南新聞》，1943年2月13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92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1991 〈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林衡道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2：227。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
1999 《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草根。
- 王育德（著），吳瑞雲（譯）
2002 《王育德自傳：出生至二二八後脫出臺灣》。臺北：前衛。
- 王曉波
1988 《臺灣史與臺灣人》。臺北：東大。
- 王曉波（編）
2002 《二二八真相》。臺北：海峽學術。
2004 《國民黨與二二八》。臺北：海峽學術。
- 王景弘（編譯）
2002 《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臺北：玉山社。
- 甘得中
1960 〈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林獻堂先生追思錄》，頁29。臺北：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
- 史明
1980 《臺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蓬島文化。

- 矢內原忠雄
1988 《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
- 臺灣總督府（編）
1914 《臺灣總督府法規提要》第5輯。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臺灣總督府（編），王乃信（等譯）
1988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一)文化運動。臺北：創造。
1987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五)右翼運動。臺北：創造。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編）
1992 《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古野直也（著），許極燉（譯）
1994 《臺灣近代化秘史》。高雄：第一。
- 吳濁流
1987 《臺灣連翹》。臺北：年代文庫。
1988 《無花果》。臺北：前衛。
- 吳叡人
2006 〈用雷頓的族群政治看臺灣〉，《中國時報》，2006年3月23日，電子版。
- 李筱峰
1995 《臺灣，我的選擇》。臺北：玉山社。
1996 《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時代》。臺北：玉山社。
2003 〈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獨立運動〉，收於李旺臺總編輯，《二二八事件新史料學術論文集》，頁136-138。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李國祁
1994 〈滿清的認同與否定：中國近代漢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頁96-9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李喬
1987 《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北：前衛。

呂興忠(編撰)

2004 《彰化縣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近藤正己

1996 《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周婉窈

2003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

林忠勝(編著)

2005 《劉盛烈回憶錄》。臺北：前衛。

林宗義(口述)

1991 〈我的父親林茂生〉，收於胡慧玲，《島嶼愛戀》，頁16-17。臺北：玉山社。

林宗義(著)，慧文(譯)

〈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收於胡慧玲等編輯，《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實錄》，頁112。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林紫貴

〈重建臺灣文化〉，《臺灣文化》復刻版上冊，1(1)：17。

林美容

1996 《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臺北：前衛。

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

1999 《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胡慧玲(等編輯)

1991 《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運動實錄》。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柯遠芬

〈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相〉，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柯遠芬暨彭孟緝回憶錄》，頁12。未出版。

施正鋒

1998 《族群與民族主義》。臺北：前衛。

1999 〈臺灣意識的探索〉，收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頁60。臺北：海峽學術。

秦孝儀(主編)

1990 《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

1990 《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張炎憲

1991 〈戰後初期臺獨主張產生的探討〉，《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頁288-289。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

張炎憲(主編)

2005 《王添灯紀念輯》。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

2000 《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張炎憲、李筱峰(編)

1989 《二二八事件回憶集》。臺北：稻鄉。

荆子馨(著)，鄭力軒(譯)

2006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

陳小沖

1991 〈1937-1945年臺灣皇民化運動述論〉，收於陳孔立主編，《臺灣研究十年》，頁496-497。臺北：博遠。

陳芳明(編)

1991 《臺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臺北：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1996 《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

1994 《陳逸松回憶錄》。臺北：前衛。

陳佳宏

2004 〈清代至日治初期臺灣之認同糾葛〉，《輔仁歷史學報》15：299-304。

2006 《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

2006 〈「臺獨進程五階段論」之歷史觀察〉，《2006年林本源中華文化基金會年會暨臺灣史研討會》，頁91-11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俐甫

- 1992 〈臺灣民族意識發展史研究：到國民主義之路〉，《第四屆臺灣新生代論文研討會》，頁10。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
- 陳永興
- 1989 《拯救臺灣人的心靈》。臺北：前衛。
- 陳翠蓮
- 1995 《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臺北：時報。
- 陳正修、王康陸、黃嘉光（合編）
- 1991 《臺灣獨立運動三十年：張燦鑒選集》。臺北：前衛。
- 屠申虹
- 1989 〈介紹「二二八事變親歷記」〉，收於李敖，《二二八研究續集》頁396。臺北：李敖。
- 許雪姬
- 1990 〈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思與言》，29（4）：158。
- 許雪姬（訪問紀錄）
- 〈楊熾昌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二）》，頁2。未出版。
-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
- 1997 《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世楷
- 1995 〈日本支配臺灣的機制與意識型態〉，收於臺灣研究基金會編，《百年來的臺灣》，頁38。臺北：前衛。
- 莊嘉農
- 1990 《憤怒的臺灣》。臺北：前衛。
- 彭孟緝
- 〈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柯遠芬暨彭孟緝回憶錄》頁59、62。未出版。
- 彭明敏
- 1995 《自由的滋味》。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 黃昭堂
- 1997 《臺灣那想那利斯文》。臺北：前衛。
-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
- 1989 《臺灣總督府》。臺北：自由時代。
- 黃英哲
- 1998 〈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臺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一〉，收於張炎憲、陳美容、楊雅慧合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93。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 黃武東
- 1988 《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臺北：前衛。
-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
- 1991 《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獨家。
- 黃華昌（原著），蔡焜霖（翻譯）
- 2004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
- 黃俊傑
- 1998 《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
- 2005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國前途的看法：以1920年代「中國改造論」的辯論為中心〉，收於賴澤涵、朱德蘭主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頁109-110。臺北：海峽學術。
- 楊金虎
- 1990 《七十回憶》。臺北：龍文。
- 楊肇嘉
- 1970 《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
- 楊聰榮
- 1990 〈從民族國家模式看戰後臺灣的中國化〉，《第四屆臺灣新生代論文研討會》，頁2-3。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
- 葉榮鐘
- 1960 〈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追思錄》，頁79-82。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

葉榮鐘（等合著）

1993 《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

1994 《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

廖欽福（口述），林忠勝（撰述）

2005 《廖欽福回憶錄》。臺北：前衛。

廖文毅

1956 《臺灣民本主義》。東京：臺灣民報社。

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

1993 《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

鄭欽仁（口述），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訪問）

2004 《鄭欽仁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鄭純宜（主編）

1999 《被出賣的臺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臺北：臺北228紀念館。

賴澤涵訪問

1992 〈彭孟緝將軍訪問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一）》頁2。未出版。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

1995 《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

賴澤涵、許雪姬（主訪），許雪姬（紀錄）

1992 〈柯遠芬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一）》，頁2。未出版。

鄧孔昭（編）

1991 《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

戴國輝

1994 《臺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

戴國輝、葉芸芸

1992 《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臺北：遠流。

鍾謙順

無出版年 《煉獄餘生錄：坐獄二十七年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

魏永竹（主編）

1992 《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顏娟英

1998 〈戰後初期臺灣美術的反省與幻滅〉，收於張炎憲、陳美容、楊雅慧合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80。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蘇瑤崇（主編）

2004 《最後的臺灣總督府：1944-1946年終戰資料集》。臺中：晨星。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著），吳叡人（譯）

1998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

葛超智（George Kerr）（著），陳榮成（譯）

1996 《被出賣的臺灣》。臺北：前衛。

Tsurumi, E. P.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Entanglement of Taiwan Identity from the Middle of Japanese
Rule Period to 228 Incident -- analysis based on Taiwanese elites

Fupian Chen

Abstract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Japanese in the primary rule period, most Taiwanese cannot help choosing to surrender themselves to the occupied of Japan. However, some Taiwanese still put their country identity on the mother country (Ching Dynasty 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Japanese rule period, when Taiwanese elites try to strive for their right, they must compare the long and profound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with Japanese history out of insufficient confidence and the great authority of Japan. Nevertheless, the stereotype of the life in mother countr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reality in China then. Taiwanese cannot figure out the actual political situation or they even have no idea to the Chinese treacherous politic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aiwanese have to cooperate with Japanese except escaping to China.

However, with increasing conflict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authority of Japan cannot tolerant that Japanese-Empire people have disloyalty including the Taiwanese. Not only the identity but also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is restrained under the policy of becoming Japanese. The result of WWII defeats the „Japanization“ in Taiwan; besides,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governs Taiwan with the great authority. Subjectivity of Taiwan is given a blow again or it is forgotten within the China identity. In 1947, the 228 Incident overturns inclination of Taiwan Identity unexpectedly. The 228 Incident changes the pursuit of self-government or self-rule in middle of Japanese rule period into the independency of Taiw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aiwanese elites' entanglement of Taiwan Ident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end of WWII and the 228 Incident.

Keyword: Identity, Ethnic relationship, 228 Incident, Taiwan Independenc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從在來犁到改良犁：
臺灣的犁具改良(1900s~1960s)*

蔡承豪**

摘 要

農業生產效能之高低，有賴農具的精良。犁的發明，使得農業耕作效率得以大幅提昇，甚至還有說法認為，犁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農具。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政府及民間皆積極進行犁的改良。在1900年前後，由民間的農具專家完成了兼具穩定度並可以深耕的日式短床犁。而臺灣的在來犁，於17世紀時由中國傳入臺灣，優點在於穩定性高、重量較輕，可以一人一牛的方式搭配耕耘，但缺點則為不易深耕，且容易損壞。為提升生產力，日治時期的農事單位也在臺灣從事犁具改良，在1922年完成首批臺灣改良犁。其後，隨著日本改良犁的輸入，以及官方、民間分別投入犁具改良，終使臺灣的改良犁日趨成熟，逐漸取代在來犁的地位，並使臺灣犁具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關鍵詞：在來犁、改良犁、日式短床犁、牛耕、末永仁。

* 本文之撰寫，承業師溫振華教授指導。在資料收集及田野訪查中，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戴寶村教授、屏東科技大學陳光輝老師、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蕭景文董事、臺灣歷史博物館林佳蓉小姐等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